

政治·外交

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极端化及“去极端化”

安高乐 唐探奇

摘要：受印尼国内伊斯兰化以及国际伊斯兰跨国运动的影响，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苏哈托政府倒台后组建了许多极端组织，这些极端组织给印尼国家安全和东南亚地区安全带来了极大危害。“9·11”事件以后，美国通过“反恐”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并捣毁了“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在南亚的大本营，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南亚大本营为依托的“基地”组织被迫从原来的集中型向“去中心化”方向转变，从南亚向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扩散，并与东南亚本土的极端组织共谋发动恐怖袭击。印尼巴厘岛爆炸事件后，印尼政府在采取军事“反恐”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柔性的“反恐”措施，内容包括“识别”“康复”“再教育”和“重返社会”等。印尼的“去极端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警察据此掌握了恐怖主义网络的大量情报，还利用“改过自新”的前恐怖主义分子作为教育主体，到监狱教育说服其他极端分子放弃极端意识形态。此外，还为在押囚犯培养一定劳动技能，以便其释放后能自食其力，从而减少释放后因经济不能独立而重返极端组织的可能。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宗教极端化；伊斯兰之家；伊斯兰祈祷团；“去极端化”

收稿日期：2021-05-26

作者简介：安高乐（1973~），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安全问题；唐探奇（1996~），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社会中去极端化模式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7BGJ066）的阶段性成果。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指逐渐指向极端宗教的社会心理过程，它可能不一定会导致暴力，但却是暴力必备的几个风险因素之一。导致暴力极端主义的极端化是通过参与暴力的非国家运动而加剧的社会和心理过程。暴力极端主义有两个表现形式：加入实施暴力的组织和参与暴力活动。因此，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工作的核心

是减少暴力参与和改变个人的意识形态或认知。^①“去极端化”计划的主要工作就是努力改变极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或认知，从而反过来减少极端暴恐活动。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尼西亚境内出现了一些极端和暴力的团体。2001年底，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逮捕极端组织“伊斯兰祈祷团”(JI)一些恐怖分子。两国都认为JI在印度尼西亚拥有更大网络。然而，直到JI开始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政府才开始针对JI成员采取行动。印尼政府对极端伊斯兰主义危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许多印尼人并不认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是一种威胁，反而认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针对穆斯林的战争。^②此外，由于主流穆斯林将极端伊斯兰团体视作穆斯林社会的一部分，政府为获得主流穆斯林的支持而对极端伊斯兰组织采取纵容态度。^③自2002年巴厘岛爆炸事件后，印尼政府才彻底改变了对极端组织的态度，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予以打击：一是积极监控和监禁发动袭击的“圣战”分子，警方抓获300多名武装分子；二是通过“去极端化”措施来改变“圣战者”的态度。^④本文主要探讨印尼极端化的起源及极端组织、极端主义的危害、极端化的诱因、“去极端化”的措施。

一、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极端化运动的起源及极端组织

印尼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最早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是1945年成立的“伊斯兰之家”。^⑤1945年印尼摆脱荷兰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颁布的宪法没有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而是将潘查希拉五项原则^⑥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为此，一些伊斯兰组织对政府采用世俗主义的立国原则感到不满，“伊斯兰之家”在西爪哇发动叛乱，后来又蔓延到该国的其他地区，直到1960年才平息下来。1967年苏哈托上台后，伊斯兰极端组织再次受到抑制，被列为极端右翼组织。苏哈托在任期最后几年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印尼军队的支持，转而向右翼穆斯林求助，以维持其政治现状。为实现这一目标，苏哈托支持修建清真寺。这可能是印尼当前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的早期推动因素之一。

^① Eric Hiariej, “Reducing the Recruitment and Recidivism of Violent Extremists in Indonesi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August 2017, p.10.

^② Smith, “The Politics of Negotiating the Terrorist Problem in Indonesia”,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ume 28, Issue 1, 2005, p.37.

^③ Ibid..

^④ Nick O’ Brien, “Interview with a Former Terrorist: Nasir Abbas’ Deradicalization Work in Indonesia”, *CTC Sentinel*, Vol.1, Issue 12, November 2008, p.1.

^⑤ Francisco Galamas, “Terrorism in Indonesia: An Overview,”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at Espany Art Institute, 04/2015, p.1.

^⑥ 潘查希拉五项基本原则是指：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

随着苏哈托政权在1998年倒台，印度尼西亚新政治环境使先前被压制的极端主义团体得以抬头。苏哈托继任者哈比比放松了对宗教组织的管制，释放被囚禁的极端主义者。之后瓦希德奉行类似哈比比的政策，对极端伊斯兰组织“破坏政治多元化和建立哈里发”的言论放松了管制。直到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发生后，印尼政府对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态度才发生了巨大转变。这次袭击迫使印尼政府加大了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打击力度。印尼国内主要的极端组织有以下几个。

（一）“伊斯兰之家”

该组织为西瓜哇的达尔伊斯兰运动的一个分支，成立于20世纪30~40年代，当时是作为一个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政治组织，目标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后被政府禁止。20世纪50年代，该组织曾因领导亚齐、南苏拉威西和西瓜哇地区的反叛运动名噪一时。该组织目前分为温和派和极端派。极端派主张进行武装斗争，接受中东国家、欧美国家穆斯林的资助。该组织下设军事组织，名为“伊斯兰印尼军”，名叫柴达尔的发言人声称参与了2011年雅加达的一些袭击事件。^①

（二）“伊斯兰祈祷团”

“伊斯兰祈祷团”是东南亚最大的极端组织。它的两位头目阿卜杜拉·桑卡尔和阿布·巴卡尔·巴赛尔最初是“伊斯兰之家”的成员，在荷兰殖民统治结束后试图在印尼建立哈里发国家并实施伊斯兰教法。阿卜杜拉·桑卡尔和阿布·巴卡尔·巴赛尔在建立“伊斯兰祈祷团”之前，曾迫于政府压力离开印尼，逃到马来西亚，招募年轻的穆斯林志愿者去阿富汗对抗苏军，并借此与“基地”创立者建立了联系。^②在与“伊斯兰之家”领袖阿延安·马斯库迪发生争执后，桑卡尔决定另起炉灶，并在马来西亚建立“伊斯兰祈祷团”。1998年苏哈托总统下台，印尼政府放松了对极端组织的管控。两位头目回到印尼，1999年桑卡尔死亡，马斯库迪接管了该组织。

在意识形态方面，“伊斯兰祈祷团”是“伊斯兰之家”和沙特瓦哈比教派两种意识形态的混合体，其目标是在东南亚各国建立伊斯兰教国家。该组织成员最多时达到几千人，组织结构分为领导层和非领导层。非领导层包括炸弹制造者和人体炸弹执行者。^③该组织的宣传和招募方式除使用因特网作为主要招募方式外，还通过宗教学校等组织进行人员招募。在资金来源方面，“伊斯兰祈祷团”主要接受伊斯兰慈善机构的捐赠，此外也进行武器走私和敲诈勒索。“伊斯兰

^① 李伟等：《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年鉴》，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207页。

^② Francisco Galamas, “Terrorism in Indonesia: An Overview”,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at Espany Art Institute, 04/2015, p.3.

^③ Ibid., p.4.

祈祷团”实施的暴恐袭击事件包括暗杀国内外政治人物、2000年雅加达证券交易所停车场汽车爆炸案以及2002年巴厘岛连环爆炸案。^①“伊斯兰祈祷团”与“基地”组织间的联系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两个组织的联系始于“圣战”组织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之后一直存在共谋行为。据称，“伊斯兰祈祷团”实施巴厘岛爆炸事件时得到了后者的技术支持。^②2002年后，经过印尼警方持续不断打击，“伊斯兰祈祷团”对国家的威胁大大减小。2003年一直在逃的首领帕拉·维贾扬托已于2019年6月28日被抓捕归案。^③

（三）“圣战军组织”

该组织成立于2000年1月，是目前印尼规模最大、结构最完善的准军事组织，还是1988年成立的“逊尼圣战军联系论坛”的分支机构。“圣战军组织”领导人贾法尔·乌马尔·塔里布曾于1987~1989年间在巴基斯坦加入“圣战”运动，之后回到印尼。1991年，塔里布回到中东，受到萨拉菲-瓦哈比思想的影响。1993年再次回到印尼。为发动圣战，“圣战军组织”在东爪哇省建立训练营，招募约3000名战士，这些战士后来被派往马鲁古。^④瓦希德总统曾试图阻止该组织成员前往马鲁古，不但毫无结果，还引发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的社区冲突。

该组织宣传策略是借助大众传播网络来影响印度尼西亚舆论，将自己标榜为穆斯林捍卫者，进而影响政治领导人。巴厘岛爆炸案发生后，印尼政府立场发生改变，梅加瓦蒂总统在爆炸一周后签署两项“反恐”法令，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采取果断措施。2002年5月，塔里布被拘捕。同年，“逊尼圣战军联系论坛”执行委员会遣散该组织，原因是其在马鲁古发动的恐怖活动背离了某些伊斯兰基本教义。^⑤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政府对极端组织采取行动让一些较温和的伊斯兰组织与其划清界限，主动与政府配合。

（四）“东印尼圣战者”

该组织成立于2012年，总部设在苏拉威西岛中部，领导人是桑托索。“东印尼圣战者”的资金来源最早是通过互联网欺诈活动（通过入侵外汇交易网站）筹集大量资金，以支持其活动。其他筹款方式还包括抢劫银行和从事其他犯罪活

^① Francisco Galamas, “Terrorism in Indonesia: An Overview”,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at Espany Art Institute, 04/2015, p.5.

^② Ibid..

^③ Raymundas Rikang, “Pandai Besi Setelah Dua Windu”, *Tempo*, 13 Jul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majalah Tempo.co/read/158027/pandai-besi-setelah-dua-windu>.

^④ Francisco Galamas, “Terrorism in Indonesia: An Overview”,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at Espany Art Institute, 04/2015, p.7.

^⑤ Ibid..

动。印尼政府在过去几年中捣毁了该组织的大部分机构，但其领导人桑托索仍然逍遥法外，现在已成为重点追捕的恐怖分子之一。

（五）“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2014年，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内部出现了极端的印度尼西亚“圣战”分子。包括JI在内的一些极端组织开始宣誓效忠“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甚至一部分极端主义者还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战。在短暂时间里，印尼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清真寺公开宣誓效忠，并在雅加达街头举着恐怖组织的黑旗游行。该组织在印尼虽然没有强大的组织机构，但通过中小型规模的袭击来制造恐怖气氛。该组织的袭击活动包括2016年1月在雅加达市中心的星巴克和购物中心发动的爆炸和枪击事件，2018年5月在泗水针对警察和教堂的自杀式爆炸袭击，2019年10月对印度尼西亚首席安全部长维兰托的持刀袭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印尼的首选目标是警察，在他们看来，警察是非伊斯兰的象征。^①在伊斯兰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政治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宗教少数群体是他们袭击的第二大目标。“伊斯兰国”组织遭到了印尼政府的重点打击，印尼政府挫败了该组织一系列的针对西方或印尼政府的大规模袭击，最典型的是挫败了企图袭击巴厘岛和炸毁总统府的阴谋。^②目前，“伊斯兰国”组织网络已被摧毁，其在印尼的“圣战”结构已从组织转变为自治网络和分支机构，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对警察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袭击也变成零星式和小规模袭击。^③

（六）“国家帮助者社区”（JAD）

JAD以前由印度尼西亚最有影响力的亲“伊斯兰国”传教士阿曼·阿卜杜拉赫曼领导，是一个亲“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伞形团体，主要分布在爪哇岛自治地带。JAD曾伙同“伊斯兰国”2018年一道实施泗水恐怖事件，之后该组织因警方大规模逮捕而遭到破坏。^④

二、印尼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危害

（一）影响经济

首先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恐怖主义行为影响世界经济稳定。“9·11”事件

^① Quinton Temby, “Terrorism in Indonesia after ‘Islamic State’”, Yusof Ishak Institute, Issue3, 2020, p.2.

^② Ibid..

^③ Ibid., p.1.

^④ Ibid., p.5.

发生后，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①“9·11”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经济，亚洲经济衰退影响了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国家。^②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4.90%下降到2001年的3.32%。^③其次，从国内来看，印度尼西亚恐怖组织操纵的几次爆炸事件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冲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印度尼西亚经济因恐怖主义威胁使投资者的信心下降。^④巴厘岛遭受两次爆炸袭击后，高度依赖安全和政治稳定的经济部门受影响程度最深，这些行业包括旅游业、资本市场、投资和国际贸易等。相关研究显示，巴厘爆炸事件使2002年印尼的GDP降低0.30%~0.74%，从预计增长目标4%降低至3.26%~3.70%左右。^⑤428栋建筑物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5.92万亿卢比。^⑥巴厘岛爆炸案的另一个影响是使股市投资者信心受到影响，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指数急剧下跌，并且创下历史最低点。据世界银行估算，巴厘岛暴恐事件不仅影响了印尼经济稳定和消费者信心，而且还波及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爆炸案不仅对本地旅游业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对投资、生产、出口活动等领域造成困难和障碍。^⑦2003年8月5日万豪酒店爆炸案发生后，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大幅波动，以外国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资本减少，许多已有的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迁移到其他国家。^⑧2004年9月9日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发生爆炸，在爆炸之前，雅加达综合指数（JCI）的股价已升至最高水平，即792,672点，爆炸之后，JCI立即跌至最低点757,003，以782,650点收盘。^⑨

需要特别指出，在遭受暴恐袭击影响的行业中，旅游业首当其冲。根据“全

^① W.Y. Hung, “Review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Terrorist Attack Fi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Engineering Performance-Based Fire Codes*, Vol. 5 No. 2, 2003, pp. 45~49.

^② Muhammad Hatta,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on Indonesia’s Econom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Creativity and Change*, Volume 9, Issue 2, 2019, p.336.

^③ Ibid..

^④ S. Bandyopadhyay, J. Younas and Sandler, “The Toll of Terrorism”, *Finance & Development*, Vol. 52 No. 2, 2015, pp. 26~28.

^⑤ Muhammad Hatta,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on Indonesia’s Econom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Creativity and Change*, Volume 9, Issue 2, 2019, p.337.

^⑥ E.T.Pratiwi, “Impact of criminal act of terrorism on economy”, *IOP Conf.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9, p.3.

^⑦ Ibid..

^⑧ Muhammad Hatta,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on Indonesia’s Econom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Creativity and Change*, Volume 9, Issue 2, 2019, p.338.

^⑨ Ibid..

球旅游组织”的统计，旅游收入占印尼GDP的2.5%，创造的就业率为3.5%。^①在遭受袭击的城市中，巴厘岛严重依赖旅游业，爆炸案对当地和区域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旅游业在袭击后遭受重创。在2002年巴厘岛发生恐怖袭击之后的一年内，游客人数减少891,000人，同比下降32%，造成旅游收入的巨大损失。^②2005年巴厘岛第二次爆炸事件又使得游客比上年减少402,000人。^③

（二）“圣战”扩大

尽管在2002年巴厘岛和2009年万豪酒店爆炸事件中有两兄弟一起参与的现象，但整个家庭参与暴恐袭击的态势还不明显，且主要是男性实施恐怖袭击。随着极端思想的不断扩大，极端思想导致的恐怖袭击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对家庭或亲属关系网络的依赖增加、妇女参与攻击以及利用儿童参与恐怖袭击的事件在增加。在印尼，包括幼儿在内的家庭式自杀式袭击是一种新作案手法。2018年泗水连环爆炸事件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其中男性家长组织实施，妇女儿童参与，而且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出现为女性穆斯林参与恐怖袭击事件提供了一个平台，为扩充成员，这个组织突破了传统的限制，招募女性成员参与恐怖袭击事件。^④“伊斯兰国”在印尼的女性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鼓励甚至招募男子参加圣战，说服家人前往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少数女性还加入“东印尼圣战者”并成为波索区的游击分子，有的帮助丈夫制造炸弹，有的自愿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⑤除妇女外，儿童参与恐怖袭击也日益成为一种趋势。米娅·布鲁姆的研究显示，“伊斯兰国”已普遍利用儿童和青年作为恐怖袭击者。^⑥

（三）造成人员伤亡

印尼和东南亚各国经历了两波恐怖主义高潮。第一波浪潮发生在2002年至2008年之间，当时菲律宾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和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祈祷团”分别造成301和274人死亡。^⑦第二波始于“伊斯兰国”及其

① William Kwadwo Amankona, “Terrorism terrorizing Tourism”, Master Thesis in Tourism of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June 2016, p.38.

② Chia-yi Lee, “Resurgent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Impact on the Economy”, *RSIS Commentary*, No. 012, 21 January 2016, p.1.

③ “Global Rescue and 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Crisis Readiness”, *Crisis Readiness*, October 2019, P.8.

④ Kirsten E. Schulze, “The Jihadi Threat to Indonesia”,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June / July 2018, p.4.

⑤ Ibid..

⑥ Mia Bloom, John Horgan, and Charlie Winter, “Depictions of Children and Youth in the Islamic State’s Martyrdom Propaganda, 2015-2016”, *CTC Sentinel*, Vol.9, Issue2, 2018, p.1.

⑦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8”,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p.54.

附属组织，从2016年到2017年，整个东南亚的恐怖主义死亡人数增加了36%。^①根据维基解密统计，从1981年3月到2019年11月的39年时间里，恐怖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在印尼领土上实施的恐怖袭击总共造成453人死亡，1200人受伤。^②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所做的统计，“9·11”事件发生以来，印尼有的年份因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位列前茅，其中2002年位列第四。^③2015年受恐怖主义影响严重程度的国家排名中，印尼在所列的130个国家中排在第38位，分值为4.429分（分值从10~0，分值越高则受影响程度越深）。^④在2002~2016年的15年中，印尼受影响严重程度列第42位。^⑤2015~2016年是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最猖狂的年份，该组织在包括印尼在内的15个国家的308座城市发动了疯狂的袭击，2016年平均每起袭击造成8.1人死亡，而2014年每起事件造成的平均死亡数是5.7人。^⑥

（四）“伊斯兰国”极端意识形态扩大化

部分极端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之后又回到印尼继续传播极端思想。2013年“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建立刺激了印尼“圣战”组织的发展，一部分极端分子随之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据统计，2015年有500名印尼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伊斯兰国”作战。^⑦

（五）刑事犯罪恐怖化和极端化进程网络化

泗水爆炸案的诱发因素是监狱暴动事件。本来只能关押几十人的监狱用来关押上百人，人满为患。暴动发生后，警察不能控制场面。极端主义向基于互联网的活动转变以及此类技术使用方式的快速变化是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社交媒体加速了传统组织的极端化。在某种程度上，移动设备上的加密聊天解决了武装分子面对面交流的困难。在不久的将来，通信技术的进步还会进一步增加极端主义的危险性。

三、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产生的诱因

作为人口众多的一个国家，印尼屡次遭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困扰。从物质

①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8”,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p.54.

②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Terrorism in Indonesia, 26 January 2021,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rrorism_in_Indonesia.

③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6”,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p.38.

④ Ibid., p.11.

⑤ Ibid., p.47.

⑥ Ibid., p.73.

⑦ Ibid., p.73.

层面来看, 极端化的原因大体可归结为政治上的不平等、不公正和反西方情节。从文化层面来看, 主要是“伊斯兰之家”之类的极端伊斯兰组织的极端伊斯兰叙事导致的恶果。1949年, 印尼政府试图把爪哇西部交给荷兰占领军, 这刺激了“伊斯兰之家”的反政府斗争, 其叛乱活动开始于西爪哇和苏拉威西岛南部。^①另一极端化思想来自“伊斯兰祈祷团”, JI是与基地组织有紧密联系的东南亚激进组织, 在印尼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执行过多次爆炸袭击, 包括2002年巴厘岛爆炸事件和万豪酒店爆炸案。^②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的蔓延, 主因是东南亚政治和社会的快速变革, 尤其是在快速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背景下的伊斯兰化。

(一) 国内伊斯兰化

在过去几十年里, 印尼社会的伊斯兰化逐渐变得更加公开。由于过去20年伊斯兰化进程加快, 伊斯兰教日益成为政治争论背后的决定性变量, 成为许多印尼人思考社会政治制度的最重要参考框架, 他们认为伊斯兰教能够带来社会公正并实现名副其实的发展。这种所谓的“全球本土”伊斯兰教的扩张与公共领域内个人宗教信仰的增加以及伊斯兰机构的扩散有关。^③事实上, 尽管印尼大多数穆斯林是宽容温和的, 伊斯兰化不一定会助长伊斯兰极端主义, 但它培育的穆斯林群体会更多地支持或至少同情伊斯兰主义观点和议程。从1998年开始, 苏哈托政府倒台后的动荡局面也为强硬的伊斯兰主义者组织、招募和动员追随者提供了政治空间和机会。

(二) 伊斯兰运动的跨国影响

国际伊斯兰主义影响也是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苏哈托新秩序政权的最后几年, 跨国伊斯兰主义叙事和极端主义的蓬勃发展为后苏哈托时代印尼政治舞台上激进伊斯兰团体的爆发打下了基础。这些团体的成员与“圣战者”在印尼一起推行“圣战”活动。伊斯兰运动的成功关键在于先前存在的伊斯兰网络, 随着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蓬勃发展, 这些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发展。伊斯兰教团体如达瓦团体、宗教学校、清真寺和媒体等社会网络使得个人有机会互动、协商, 并为其行动建立观念和动机框架。伊斯兰团体将国内事件与伊斯兰世界发生的危机事件紧密联系起来, 将伊斯兰教法、“圣战”和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解决印尼国内危机事件的唯一方法。这些团体质疑现代民

^① Masmuhah, “Indonesia’s Moderate Islam Countering Religious Radical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JASOS- International E-Journal of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 III, Issue 8, August 2017, p.723.

^② *Ibid.*, p.724.

^③ David Timberman, “Violent Extremism and Insurgency in Indonesia: A Risk Assessment”,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anuary 7, 2013, pp.2-3.

族国家的形式，同时表达其对将印尼改造为“哈里发国家”的浓厚兴趣。

（三）拒斥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

印度尼西亚1945年宪法有意避免将伊斯兰教指定为印度尼西亚的官方宗教，它规定宗教自由，并赋予“所有人根据自己的宗教或信仰进行礼拜的权利”。“潘查希拉”的第一宗旨，即1945年以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宣称信仰一个上帝，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个上帝，宪法也不赋予伊斯兰教法特权。^①因此，长期以来伊斯兰团体一直认为印尼政府对伊斯兰法律和治理存在偏见并对政府不满。一些组织如“伊斯兰祈祷团”和“印度尼西亚解放组织”也拒绝接受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是寻求建立一个由东南亚穆斯林组成的伊斯兰哈里发国。除此之外，伊斯兰主义者认为民主是西方的和非伊斯兰的，并认为某些人权和政治权利是非伊斯兰的和有罪的。

（四）拒绝宗教多元化

在印度尼西亚，宗教宽容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技巧。绝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但也有大的基督徒、印度教徒、什叶派穆斯林和土著宗教团体。伊斯兰激进分子强烈反对穆斯林“异端”（例如艾哈迈迪亚教派）和基督教传教士，伊斯兰主义者还反对在伊斯兰教内部促进多元化和“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

（五）伊斯兰主义者反对现代化

伊斯兰激进分子将印尼的现代化和发展视为西方化的过程，认为会削弱伊斯兰价值观。“彭贝拉伊斯兰阵线”的创始人认为：伊斯兰价值观正受到“西方颓废、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和不道德行为的挤压，而迅速的民主改革加速了这一进程”。这种反对在各种领域都有体现：在神学领域攻击“自由”伊斯兰教，在文化领域努力禁止西方音乐、电影、音乐会，在社会和道德领域禁止现代女装。^②

（六）相对剥夺感带来的挫折感

贫困和欠发达是暴力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但并不必然是暴力极端主义的诱因。相反，由于印尼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但又不稳定且不平衡，因此被剥夺感更可能成为暴力极端主义产生的诱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尼青年失业率相对较高，达到20%~30%。^③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青年，尤其是城市地区的青

^① David Timberman, “Violent Extremism and Insurgency in Indonesia: A Risk Assessment”,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anuary 7, 2013, p.3.

^② *Ibid.*, p.4.

^③ The World Bank Office Jakarta, “Education, Training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for Youth in Indonesia”, *Hum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In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p.13.

年，非常了解印尼城市中的中上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农村地区的民众通过电视和其他媒体接触到城市中富人阶层的生活。因此失业年轻人中的一些人会怨恨他们所看到但无法达到的富裕生活阶层。^①伊斯兰跨国运动进一步传播和放大了这种不满和怨恨，伊斯兰教作为抵抗西方政治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球象征，在面临高失业率的年轻印尼穆斯林中获得了进一步的认可。正是由于这种动员力量的存在，年轻人在尝试构建身份时愿意与伊斯兰教接触。这些年轻人实际上是全球伊斯兰复兴信息流中的重要传播者。他们创造性地将这些信息转化为生活方式、时尚、艺术、音乐、小说、书籍、机构和组织。反过来，这些信息又会影响多个社会和政治领域，并形成集体的跨国身份建构。^②

（七）“传送带”的助推作用

各种“传送带”的存在，促进了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最主要的“传送带”包括媒体和宗教聚会。在印尼，较为发达的媒体在促进宗教和政治扩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问题，如巴勒斯坦、阿富汗、波斯尼亚、克什米尔和菲律宾旷日持久的冲突通过媒体促进了伊斯兰主义者的聚合和联系。伊斯兰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伊斯兰书籍在印度尼西亚广泛传播。苏哈托政府垮台以来，印尼出版了数千种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其中的一些书籍明显支持和宣传“圣战”。^③

互联网是好战的伊斯兰主义者在印尼扎根和传播其“圣战”言论的工具。通过互联网，伊斯兰主义者可以将宣传其思想和活动的小册子立即散布到已建立伊斯兰网络的地方。互联网也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整个地区民众互动连接的渠道。

印度尼西亚的另一传送带被称为“马杰利斯塔克林”，是宗教学习和实践的定期聚会，它在关于民族宗教信仰的公共话语中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苏哈托政权倒台后，印尼政府取消了对结社和集会自由的限制，“塔克林”作为一种宗教教育的方式和一种娱乐形式的流行度飙升。这种宗教聚会可以吸引几十到几千名参与者，这主要取决于演讲者对宗教的态度。

^① Dale F. Eickelman and James Piscatori, *Muslim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9.

^② Martin Van Bruinessen, “Indonesia Muslims in a Globalization World”, The RSIS Working Paper,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ngapore, p.13.

^③ David Timberman, “Violent Extremism and Insurgency in Indonesia: A Risk Assessment”,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anuary 7, 2013, p.4.

四、印尼政府的“去极端化”措施

与其他国家的“去极端化”不同，印尼的“去极端化”是以警察为中心的脱离接触的计划，以应对环印尼群岛不断发生的恐怖主义。^①印尼政府于2005年开始尝试通过伊斯兰学者来反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当时的印尼副总统召集一群伊斯兰学者来研究如何打击宗教极端主义。^②印度尼西亚警方决定在打击JI的同时，开始实施一项专门针对在押恐怖分子的计划，最初的目的是识别和锁定可以被说服，并提供关于其他“圣战”分子情报信息的囚犯，该计划后来被称作“去极端化”计划。^③“去极端化”计划是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柔性方式实施“反恐”政策的努力之一，是一个有计划的、系统的、综合的和持续的过程，旨在消除、减少和扭转滋生恐怖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印尼的“去极端化”还包括“脱离接触”计划。^④这些计划不仅通过说服极端主义者接受主流宗教，抛弃极端意识形态，而且还通过为囚犯提供生活指导、帮助组建家庭、为其家庭提供经济援助、提高劳动技能等来建立脱离接触的条件。^⑤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第一个“去极端化”计划针对的是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JI成员，重点是“去极端化”和脱离接触。实际上，该计划的目标是收集有关极端分子的情报并防止恐怖袭击。^⑥去极端化强调两个核心步骤：1.脱离接触，旨在鼓励极端分子重新评估自己，从而放弃极端暴力行为；2.去意识形态化，这是通过包括职业技能培训的“康复”教育，让极端分子抛弃极端宗教意识形态。前一个步骤强调抛弃暴力行为，后一个步骤强调抛弃极端态度。脱离接触不一定会“去意识形态化”，但“去意识形态化”必然会脱离接触。^⑦印尼“去极端化”计划主要在监狱或者康复中心进行，主要包括识别、康复、再教育和重返社会几个阶段。

^① J.Horgan & K.Braddock, “Rehabilitating the Terrorists?: Challenges in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eradicalization Program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ssue22, Number2, 2010, p.273.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Deradicalization and Indonesian Prisons”, *Asia Report*, Vol.11, No. 142, 2007, p.2.

^③ Amanda K.Johnston,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eradicalization Programs for Islamist Extremists”, Institutional Archive of the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December2009, p.40.

^④ Mohammed Ilyas, “De-Radicalisation and Humanitarianism in Indonesia”, *social sciences*, 3 March 2021, p.8.

^⑤ Andrew. Silke,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in Prisons: A Review of Key Recent Research and Critical Research Gaps”,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ume11, Issue5, 2017, pp.2-4.

^⑥ Mohammed Ilyas, “De-Radicalisation and Humanitarianism in Indonesia”, *social sciences*, 3 March 2021, p.8.

^⑦ Angel Rabasa, “Deradicalizing Islamist Extremists”, R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enter, 2010, p.5.

（一）识别阶段

识别阶段是确定恐怖分子的初始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身份识别旨在识别已被逮捕但尚未受审或没有法律确定性的恐怖嫌疑人，印尼“反恐”机构将通过法定程序将这些嫌疑人确定为恐怖分子的阶段称为识别阶段。识别对象不仅包括恐怖分子嫌疑人，还包括极端分子的家庭和网络。在明确、完整、全面地进行身份识别计划后，接下来在监狱进行的下一步改造计划称为康复计划。这一阶段的目标还包括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家人、主要家庭成员。如果有迹象表明某个家庭已经向恐怖主义行动提供支持，则可以将这个家族扩大到其最亲近的家族（亲属）。这一阶段的目的是了解恐怖嫌疑人的极端化程度及其家人的意识和行为，所以识别的内容包括识别对象的知识结构、宗教行为和国籍、以及犯罪的原因及家庭背景等。^①

（二）康复阶段

当恐怖分子在服满刑期的三分之一且表现良好时，他们将被转移到中等安全区。通过对在押恐怖分子的鉴别可以确定其是否愿意学会为社区承担责任，以便在获释后变得独立和自信，并能够融入社会。^②康复阶段关键的第一步是恰当地安置囚犯，恐怖分子与其他囚犯有不同特点和背景，因此，狱警需要对其额外注意，以防恐怖分子在监狱中传播极端意识形态。监狱总局针对恐怖分子囚犯的特殊性，对看守所和监狱的狱警提出强制性指导。康复阶段将按三个途径进行：意识形态调节、人道对待和组织家庭探监。^③改变意识形态的方法主要包括通过宗教领袖、心理学专家与囚犯间的对话和讨论来解构伊斯兰极端叙事活动。人性化对待是让囚犯对生活充满希望。由于先前警方暴力镇压叛乱，许多“圣战”分子不信任警察，印尼“去极端化”新方法是提供人道待遇并尊重被拘押者的伊斯兰习俗。大多数警察都是穆斯林，这一事实有助于提供人道对待，维护伊斯兰价值观和提高管理康复计划的警察的声誉。此外，对前“圣战”分子实行康复前，警察通常会与其保持一周的近距离接触，以便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印尼警察“反恐”部门大部分负责人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不会阻止被关押者的祈祷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彼此间的不信任。印尼“去极端化”计划在个人层面上要求接近每个恐怖分子，除咨询外，“去极端化”方案还为在押的恐怖分子提供

^① M. M Aslam, “De-Radicalization Programs in South-East As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in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 Singapore”,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4, (June.) ISSN 2289-9855, 2016, p.156.

^② Ibid., p.156.

^③ Bella Widya, “Deradicalization in Indonesia : Implementation and Challenge,” *Journal of Terrorism Studies*, Volume 2, Number 1, May 2020, p.35.

教育机会，并为被监禁的恐怖分子的家人提供经济支持。

在某些情况下，官员会奖励配合的被拘押者，为其提供更好的拘留条件和减刑。通过人道对待被拘押者，狱警会更容易收集到其他极端分子的情报。^①组织家庭探监的目的在于努力改变囚犯家属对社会的憎恶感，主要的安抚方法包括为囚犯家属支付探监费、政府提供囚犯子女的教育费并向其家庭提供小额贷款、为狱中犯人结婚提供所需费用和医疗费等。^②康复阶段的一个核心环节是文化康复法。

文化康复法要求审讯者对被拘押者的文化有全面了解，了解其愿望和恐惧，并会使用被关押者使用的语言。根据警方咨询心理学家萨利托·萨沃诺的说法：武装分子之间谈论的话题主要是用阿拉伯语来表述的。根据安斯亚德·姆拜的说法，当他们被捕时，很少有恐怖分子愿意交谈。他们只会与信任的人说话，在他们看来，与政府有联系的每个人都是他们的敌人。即使是最有声望的宗教学者在极端分子眼中也没多少可信度，因为他们被视为政府的走狗。因此，在印尼的“去极端化”方法中，没有正式的“神学对话”。与恐怖分子打交道的最合适的人被认为是那些直接参与逮捕和审讯的人员或前极端分子。^③印度尼西亚“去极端化”方法要求警方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囚犯并建立信任纽带。“柔性反恐”主要实践者巴厘岛爆炸特遣队前指挥官、虔诚的穆斯林警察准将苏尔雅说，他有宗教义务帮助这些人找到真正的伊斯兰教。^④“去极端化”计划的一个关键是让囚犯与家人团聚，以提醒极端分子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世俗责任。正如苏尔雅所解释的那样，“去极端化”理念是将他们从极端分子神的使者带回他们的家庭。警察在关押嫌犯后，通常都会与其待在一起祈祷和讨论家庭事务，在获得嫌犯的信任后，警察会安排嫌犯与亲属见面。警方支付这些家庭的旅行和住宿费用，并为他们提供额外的经济援助。^⑤

从预防恐怖主义的角度来看，该计划在获取信息方面非常成功，使警方能够捣毁印度尼西亚的恐怖主义网络。许多嫌犯私下与警方合作，以便警察将武装分

^① Julie Chernov Hwang, “Why Terrorists Quit: The Disengagement of Indonesia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Volume 40, Number 2, August 2018, pp.328~329.

^② Magnus Ranstorp, *Preventing Violent Radicalization and Terrorism: The Case of Indonesia*, Stockholm, Swedish National Defense College, 2009, p.16.

^③ Angel Rabasa, “Deradicalizing Islamist Extremists”, R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enter, 2010, p.108.

^④ Di Martin, “Bali Bomber Now Campaigns to Stop Terrorism”,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News*, September 20, 2007.

^⑤ Angel Rabasa, “Deradicalizing Islamist Extremists”, R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enter, 2010, p.108.

子与极端网络脱离接触，其中两名前JI高级成员公开放弃并写书谴责暴力。^①当然，这种方法并非对所有囚犯都有用，有些嫌犯对自己卷入恐怖主义毫无悔意，并告诉审讯者，总有一天他们会改变地点继续作案。

此外，康复阶段的职业技能培训能够让囚犯在康复毕业后找到工作和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例如，印尼“和平铭文基金会”（YPP）创立的“去极端化”计划的重点是为决定脱离恐怖组织和暴力活动的被拘留者提供生活技能和创业机会。^②通过这种方法，YPP旨在营造有利于成功脱离接触和最终放弃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条件。虽然该项目没有明确说明宗教再教育，但在项目后期，在康复工作者与前被拘留者建立信任后，双方就可以就敏感的宗教问题进行讨论。该计划的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建立信任、协助处理囚犯困难以及帮助犯人出狱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然而，该计划只对愿意脱离接触和放弃极端意识形态者有吸引力。这种情况引出一个问题，即“去极端化”的成功是否真的归功于职业技能培训，或者囚犯本来已经脱离接触，而该计划只是提供开始新生活的机会。更有甚者，尽管建立信任并在经济上帮助被拘留者，但一些被拘留者从该康复计划“毕业”后又重返暴力。^③YPP最大障碍是缺乏持续的资金支持。

为克服资金不足的问题，将有限的资源花到刀刃上，印尼康复计划的重点集中于参加叙利亚内战而被各国驱逐出境的印度尼西亚人。^④这些人被视为重大安全风险，因为其中一些人曾经在恐怖主义营地接受过专门训练且具有前线战斗经验，且可能在印尼策划恐怖袭击。康复计划还采用强有力的说服策略来说服被驱逐者签署一份愿意遵守“潘查希拉”的合同。该计划的善后安抚由当地公民社会组织组织和提供，重点是培训被驱逐者的生活技能，并帮助其寻找可持续的工作。^⑤

（三）再教育计划

再教育计划是为服刑期达到一半的在押恐怖分子提供的。在这个阶段，囚犯可能会在监狱附近的社区接受改造，但仍然受到狱警监督。再教育计划强调加强

^① Angel Rabasa, “Deradicalizing Islamist Extremists”, R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enter, 2010, p.108.

^② Carla Power, “We Have Four Generations of Former Terrorists Here Today: Rehabilitating Extremists in Indonesia”,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0, 2018,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indonesia-deradicalization-2018-story.html> (accessed on 8 July, 2020).

^③ Mohammed Ilyas, “De-Radicalisation and Humanitarianism in Indonesia”, *Social Sciences*, 3 March, 2021, p.10.

^④ Chaula Rininta Anindya, “The Deradicalisation Programme for Indonesian Deportees: A Vacuum in Coordination”, *Journal of Deradicalization*, No.18, 2019, pp.217-43.

^⑤ Mohammed Ilyas, “De-Radicalisation and Humanitarianism in Indonesia”, *Social Sciences*, 3 March 2021, P.9.

宗教理解，并以个人方式发展道德、规范和法律，以便让囚犯能够接受本族群之外的其他族群。再教育计划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现身说法教育”。

印尼第一个完整的“去极端化”项目于2005~2007年开展，该计划不是使用宗教人士，而是使用“迷途知返”的极端分子进行现身说法教育，说服在押的恐怖分子放弃实施恐怖主义的念头。^①审讯者寻求获得“伊斯兰祈祷团”“内部人员”的信任，然后依靠内部人员影响普通的极端分子。这些前武装分子中最典型的是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西亚公民纳西尔·阿巴斯。在“伊斯兰祈祷团”正式成立之前，阿巴斯就被招募到阿富汗与苏联人作战。1992年，抗苏游击队击败亲苏政府，并开始相互斗争。阿巴斯不想参与穆斯林内斗，遂于1993年返回马来西亚。回到马来西亚后，阿巴斯一直担任焊工，直到1994年中期新成立的“伊斯兰祈祷团”领导人命令他到棉兰老岛担任“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阿布巴卡尔营的教官。1996年奉命返回马来西亚。1997年被任命为“伊斯兰祈祷团”在马来西亚沙巴地区的负责人。2001年4月，他被“伊斯兰祈祷团”任命为在菲律宾、马来西亚东部和印尼苏拉威西的负责人。当马来西亚政府开始在沙巴逮捕JI成员后，阿巴斯于2002年1月返回印度尼西亚。2003年4月，阿巴斯在印度尼西亚第一次巴厘岛爆炸事件后的镇压行动中被捕。阿巴斯认为自己的被捕是安拉的旨意，安拉希望他做一些事情。他要求与特遣队指挥官单独交谈，在获得同意后，决定回报指挥官的信任，开始劝说其他极端分子不再犯罪。阿巴斯开始与JI被拘留者交谈，敦促他们与警方合作。他会见了150~200名武装分子，其中包括一些尚未入狱的武装分子。经过他的劝说，有些人同意与警方合作，一些激进分子甚至与阿巴斯一起说服其他人放弃暴力，但也有一些人不为所动，称他为叛徒。^②

除阿巴斯以外，悔改的极端分子还包括阿里·伊姆伦和穆巴罗克。他们都因在第一次巴厘岛爆炸事件中的活动而被判处无期徒刑。2004年以来，阿里·伊姆伦一直向印度尼西亚警方提供有关恐怖主义网络的信息，并公开反对恐怖主义。阿里·伊姆伦本该被判死刑，在被免除死刑后，称自己“将继续请求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原谅”。^③警方有时会将伊姆伦带出监狱，讲述他的故事。2007年9月，在雅加达一家酒店房间接受电台采访时，伊姆伦解释说：“因为他知道恐怖分子的想法，知道他们将如何设法获得武器和炸药，将针对特定地方采取相应的行动

^① S. Jason-Leigh Striegher, “The De-radicalization of Terrorist”, *Salus Journal*, Issue 1, Number 1, 2013, p.31.

^② Angel Rabasa, “Deradicalizing Islamist Extremists”, R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enter, 2010, p.113.

^③ *Ibid.*, p.114.

以及如何实施暴恐。”他也知道“如何在逃跑时躲避警察，恐怖分子如何招募新成员以及谁最容易受到极端信息的影响”。他将这些信息提供给警方，以便可以制止暴力和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①在监狱里，伊姆伦通过录音带以安拉的名义宣扬对“圣战”的非暴力解释，称这是一场以安拉名义进行的精神斗争。

（四）重返社会计划：发展新身份并重新融入社会

囚犯脱离接触后，个人从身体上脱离极端主义团体，但仍需要建立新的身份并重新融入主流社会。虽然没有足够数据来最终确定影响再犯概率的因素，但研究者对释放犯成功地融入社会或再犯的概率提出了一些合理假设。如果能够建立一个鼓励温和行为、确保稳定就业并被社区接受的新社会网络，那么这些人将不太可能重新参与极端行为。反之，如果找不到支持性的社会网络、找不到工作者或被社区排斥，再犯的概率会相应增加。^②

印尼重返社会阶段是针对服满2/3刑期且表现良好的在押人员，在经过康复和再教育之后，经专门评估达到假释条件后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在这个阶段，被拘留者获得假释，并允许在社区服完剩余的刑期。在囚犯重返社会前，监狱与社区一道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以便囚犯在释放后不被社区拒绝。^③重返社会计划不仅包括在押犯重返社会，而且也要求其家人和社区里的居民能够在社区中生活和互动。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在犯人重返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有助于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并防止重返极端主义的生活。

总之，印尼政府的“去极端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因为人员不足，资金支持和追踪监管不到位，“去极端化”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责任编辑：王国平]

^① Angel Rabasa, “Deradicalizing Islamist Extremists”, R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enter, 2010, p.114.

^② Angel Rabasa, “Deradicalizing Islamist Extremists”, RAND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2010, p.20.

^③ M. M Aslam, “De-Radicalization Programs in South-East As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in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 Singapore”,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4, (June.) ISSN 2289-9855, 2016, p.156.